

甲午前后晚清经世思想与西学的接榫

——以孙宝瑄《忘山庐日记》为中心

秦国伟

(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, 北京 100089)

【摘要】以孙宝瑄《忘山庐日记》为切入点,通过个案分析,管窥甲午前后孙宝瑄的思想变化,考察晚清经世思想与西学如何接榫。经世思想与西学接榫点:一是理性辩证的态度,西学中源的方法;二是以“道势易位”、“君民之隔”的问题意识联通中学西学;三是以“三世进化说”看待中西不同阶段。最后得出三点启发:一是理性精神使维新思想顺理成章;二是维新思想最大的障碍在视野;三是甲午巨变将问题和道路揭示出来。

【关键词】晚清;经世思想;西学;孙宝瑄;忘山庐日记

【中图分类号】K25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1000-3541(2014)06-0119-05

DOI:10.13761/j.cnki.bflc.2014.06.018

孙宝瑄出身显宦之家,衣食无忧,依靠父兄余荫,以荫生身份谋得闲差,先后在工部、邮传部和大理院任职。孙宝瑄功名不彰,但读书不辍,交友广泛,与李鸿章、张伯熙、王文韶、孙家鼐、陈夔龙等高级官吏俱有交集,更与梁启超、谭嗣同、章太炎、宋恕、汪康年、吴彦复、夏曾佑、张元济、康广仁等人交好。孙宝瑄的《忘山庐日记》历经战火纷乱,部分遗失,现仅存1893、1894、1897、1898、1901、1902、1903、1906、1907、1908年10年的逐日记事,对生活、读书和政事见闻等俱有记载,实为研究晚清维新思想和人物的难得素材。本文选取甲午巨变前后的1893、1894、1897、1908年4年的日记,以考察晚清经世思想如何与西学接榫为线索,管见孙宝瑄选择支持维新的心路历程。

一、理学之弊与晚清经世实学思潮

经世致用,乃儒家思想的一大传统。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开始,即强调“六经”治世的道理,提倡学与行结合。此后,在儒学发展史中,虽然孔子的这一思想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,但孔子思想的原貌却逐渐被改变了形态,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兴起。理学自北宋中期兴起以后,历经宋、元、明三朝,先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理学流派。两派虽在问学路径上各有侧重,程朱重“格物穷理”,陆王重“发明本心”,但他们在维护纲常名教和尊崇孔孟方面是一致的。但随着社会变迁,

至明代后期,理学已经沦为“游谈无根”、“竭而无余华”,严重脱离实际,变成了空洞无用之学。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之前,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如杨慎、李贽、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颜元、刘逢禄、龚自珍、包世臣、魏源等开始提倡一种新的经世实学之风。经世实学思潮以“通经致用‘为价值核心,批判程朱理学’束书不观,游谈无根”,理论提倡通经致用、实事求是之学,将学术研究从儒家经典扩大到自然、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,诸如天文、地理、山岳、河漕、兵革、典礼、制度、田赋等方面俱在探问之列。

通经致用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,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图式,明清之际经世实学的兴起是儒家思想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,西方侵略者的到来只是使这个过程扩大和加强了而已。

鸦片战争以后至19世纪90年代,在经世思潮与民族危亡局势的共同推动下,以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,为了“自强”、“求富”,“采西学”、“制洋器”、“师夷智”,尽管具有浓厚的西学色彩,但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里,仍然是古老的“通经致用”传统。不论是曾国藩的“义理经世实学”,还是张之洞的“恶公羊、弃汉宋,通经致用”之说,都体现了中国经世实学的本质和风格。

【收稿日期】2014-08-03

【基金项目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级课题“中国近代青年文化与进化论的关系研究——以《新青年》为中心”。

二、从甲午巨变前的日记看孙氏思想状况

本文所论之甲午巨变并不简单以甲午战争爆发为界，因为甲午战争自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为开端，至1895年4月17日《马关条约》签字结束。战争、谈判延宕日久，加之当时消息传播不及时和不准确，日记对此巨变的反应比较滞后。故本文之甲午巨变以《马关条约》签字为界，因1895、1896年之日记遗失，兹选取1893年、1894年的日记对孙宝瑄在甲午巨变前的思想状况略作考察。

1. 无生计科举之累，有求知兴趣

现存孙宝瑄日记从癸巳年农历十一月初二（1893年12月8日）开始，时孙宝瑄不满19岁。从日记可以看出，孙宝瑄的生活内容基本可以分为三部分：读书、会友、娱乐。娱乐活动一般是看戏，与朋友宴饮等等。这一时期的生活重心在读书和会友，其实这两项内容是合二为一的：交友以砥砺思想、开阔眼界，读书以启迪智慧、厚植根基。此间，孙宝瑄关注的内容主要有四：一是儒学经书的研读；二是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；三是《左传》《明纪》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《汉书》《北史》《史记》等传统史书；四是邸报。孙宝瑄读书、交友特点有二：（一）少功利之心。读书不汲汲于科举功名，贵在探求新知，交友贵在理念相合、感情真挚；（二）用功勤，毅力坚，主动性强。每日读书日记不辍，坚持如一。

孙宝瑄在日记里总结了自己为何不急于科举的原因：一是无生计之忧，生活怡然自得。“丰衣厚食，拥书册，享安乐，傲逸自得，恐一获科名，反不能如初也。”二是无欣羨富贵之心。“生长京洛，习见熟睹，贵官显达，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，思即跻身其地，不过如是。”当然，孙宝瑄并不是摒弃科举，他只是认为“功名得失有命存焉”，不宜太急切，想先研读学问，“厚其羽毛，养其精锐，多享数年之福”^{[1] (p. 36)}。

孙宝瑄求知欲旺盛，注重精神生活，且不必为生计而烦忧，不必为科举而读书。对比一下，同样是士子，山西士子刘大鹏尽管已是举人之身，仍旧需要为生计烦忧。他在日记里写道“余适田畴，督率佣人耕种，旁观者多指而目之曰：此某某也，尚在田中耕种，毋乃不类乎？余闻之曰：言之者是不知余之所以然也，余家以耕读为业，不耕则糊口不足，不读则礼仪不知。”^{[2] (p. 45)}

2. 关注现实，信息来源渠道广阔

孙宝瑄知道科举并不是生活的全部，科举也不是求知的全部，科举只是“帖括之学”而已。他虽每日“温经”，但并没有什么感想，他感想较多的是史书、时事和诗词文章。通过史书、时事和诗词文章，他增长见闻，磨砺文采，以培养自己的治政能力。孙宝瑄对现实的了解来源于三个渠道：一是家庭环境、社会交往。孙宝瑄

父亲孙诒经曾任内阁学士，兼礼部、工部、刑部、户部侍郎等职，担任过会试同考官、翰林院侍讲、福建乡试正考官等职，门生故吏众多。孙宝瑄岳父乃李瀚章，接近权力核心，而孙宝瑄本人也交游广泛，对吏治弊端深有体察。如日记写道“晓起，诣漱师处。坐顷之，又有曹某来谒，遂共坐，痛谈近来朝廷纪纲之颓，以及士林风气之坏，太息久之。”^{[1] (p. 31)}再如“昨在新吾处，闻日本攻威海可危，今日闻荣成已不守。时局如此，奈何，奈何！”^{[1] (p. 66)}二是研读历代治政论文、历史典籍。如日记记道“览沈子敦《新疆私议》，见《落帆楼文稿》中，大旨谓守边之道，不可轻言弃地，自撤藩篱，而归本于屯田积粟，以省中国转输。因历举自汉逮明边防得失之故，昭然可鉴。”^{[1] (p. 29)}再如，1894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日记从研读“元史”而反思甲午战争的起因得失“览《通鉴》，元成宗五年……高丽王善署官府，及僭用天子礼仪器物……帝遣刑部尚书王泰亨等往厘正之。盖元时固尝有为高丽革政之举。今日本起衅之初，亦以为朝鲜革政为名，而中国弗许，请中国为革政，而中国又弗应。以致锋镝相寻，两国构难，谁执其咎欤？”^{[1] (p. 66)}三是阅读“邸报”而了解时政信息。邸报，自宋朝开始出现，至明清时，邸报更有民间化的趋势，其衍生的各种小报，“相当普遍地流传于社会中，成为一般知识分子与闻全国性事物的依据”^{[3] (p. 139)}，被西方人美誉为“具体、忠实和详细地报道了帝国内的一切事务。”^{[4] (p. 62)}邸报，迥异于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它将孙宝瑄带入到现实世界。要知道，孙宝瑄刚刚20岁，血气方刚，对时政具有兴趣是非常自然的。兹抄录1894年对邸报的阅读情况：

正月十五，阅邸报，孙京兆果以屡被参劾开缺，另补候简用。顺天府尹着陈鑫补授。

正月二十三，灯下览邸报，日来朝廷殊有振厉气象，屡读上谕，语皆严峻可畏。^{[1] (p. 7)}

3. 视野、思维仍局限于传统

从孙宝瑄所读书目上看，传统的经世实学书籍已经读过几本，如魏源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汤寿潜的《危言》等，亦对《危言》大加称赞“读汤蛰仙大令所撰《危言》一书，专论时务，洋洋洒洒，数千言……皆洞悉中外利弊，当兴当革，牛毛茧丝，剖析无遗。而文笔如长江大河，浩渺无际。令读者爽心豁目，开拓心胸，足以辟中朝士大夫数百年之蒙蔽，惜不令当局者见耳。”^{[1] (p. 56)}但是，这一时期占有绝对篇幅的还是本国史书、诗词文章。西方的科技成果已经进入孙宝瑄的生活，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、日本人阿波冈本的《万国史记》等西学书籍也已经读过，但似乎没有触动，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不被接受。日记写道“晚，与兄谈西事。《西事类编》谓：西人议院之设，亦多流弊。每树立党

援，挟持朝廷，不论理之是非，而一二有识之士，或以寡不敌众，引身乞退，如是者比比。故西人亦有称中国法制为善者。天下无无弊之政，信然。”^{[1](p.67)}从中可以看出，孙宝瑄对议院制度并不赞同，这与其之后的思想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通过这一时间段的考察，可知孙宝瑄尽管对现实不满意，亦对甲午之情状时有所闻，但并未有切肤之痛，每日宴饮、访友、练字、读诗如故，对甲午巨变仅仅寥寥几笔。

三、从甲午巨变后的日记看孙氏思想状况

日记之1895、1896两年遗失，无法细探孙宝瑄的思想脉络，甚为可惜。甲午期间，孙宝瑄上书朝廷，结果受到朝野巨大压力而离京。后他在日记中以诗言志“始承父馀荫，同向长安居。甲午忽闻变，烽烟动畿甸。螳臂力当车，朝士惟言战。我家忠孝门，不作违心语。上书效北江，慷慨陈边绪。书上计未行，俄顷群谤集。拂衣出都门，来居沪城邑。”^{[1](p.169)}1897、1898年，孙宝瑄奉母长居上海，与宋恕、章太炎、谭嗣同等人交好，与李提摩太、林乐知等外国人交流，见识愈广，学问日深，对维新图变之认识愈明。

1. 孙宝瑄的读书情况

通过对这一时期日记求知情况的梳理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孙宝瑄的读书主要集中于以下三部分内容：

第一，对经世思想的研读。这一时期，孙宝瑄对经世派实学仔细研读，并写有较多心得体会。如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、颜元的《颜氏学记》、恽敬的《三代因格论》、唐甄的《潜书》等。孙宝瑄的主要关注点有两方面：一方面，传统民本思想。民本思想乃儒家学说的立足点，是开启维新思想的闸门。他在日记中写道“读《荀子》，有云：可以夺国而不可以得天下，可以窃国而不可以窃天下。故谓汤武未尝取桀、纣之天下，桀、纣自亡之也。何则？天下归之谓之王，天下去之谓之亡。当桀、纣未放诛时，天下早去而归商、周，为天下所归，则汤、武久矣。”^{[1](p.78)}“恽子居云：政者，治乱之纪，上与下之统，天子与诸侯、大夫、士、百姓共断之。”“皇帝者，实大盗之别名耳……中国自春秋以还，天下之君主多变盗寇。至战国末，诸盗为一盗并。自是而后，或分或合，卒成以盗易盗之天下。”^{[1](p.152)}“……危其民而君赖以安，灭其民而君藉以存耳！是正黄梨州先生所云：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产业。”^{[1](p.106)}“余语凌霄曰：农、工、商贾，皆自食其力者也，而吾侪号称士，坐而食人，而不求有益于人，是狗彘也。虽然彘犹以肉养人，狗守门户，狗彘犹不徒食，则吾侪狗彘之不如。”^{[1](p.90)}另一方面，对程朱理学和科举贴括陋习的批判和对实学的强调。如日

记写道“燕生（注：宋恕）累称颜习斋国初通儒，有《颜氏学记》一书……盖先生专以崇实为本，恶汉、宋以来专执书本为学问，即程、朱主静，以谓无裨于民物政教，皆虚学也。”^{[1](p.73)}“中国无实学，无论诗赋讲读，甘蹈无用。即名为治经济家，往往纸上极有条理，而见诸实事，依然无济，不核实之病至此。昨见习斋先生云：自贴括文墨遗祸斯世，即间有考纂经济者，亦不出纸墨见解。悲夫！”^{[1](p.75)}

第二，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。自然科学知识，中国近代称之为“格致”之学。格致之学不如西人，中国人早已承认。见贤思齐，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当然是当然之事。至甲午年间，西方的铁路、电报、照相、留声机、电灯等新鲜发明已经进入达官显贵的生活，尤其是电报，在战争通讯、报纸消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有线电报在1884年由通州接到了京城，至1899年，电报遍及十几省份，初成规模。如在甲午战争之时，前方信息的传递就是通过电报进行的^[5]。而孙宝瑄往来北京、上海间，有时亦通过电报传递消息。如1897年7月14日日记写道“得海上电，家相生女无恙。”^{[1](p.124)}孙宝瑄作为对知识怀有浓厚兴趣之人，对这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研读非常用心。通过1897、1898年两年的统计发现，孙宝瑄阅读的西方自然科学书籍有《光学》《全体须知》《谈天》《化学》《天文图说》《八星之一总论》《太平洋岛受道记》《重学须知》《几何原本》《电学须知》《动植物图说》《银矿指南》《虫学论略》《西国名菜嘉花论》《居宅卫生论》《格致汇编·延年益寿论》《地学稽古论》《地球奇妙论》《禽鸟简要篇》等20多种，囊括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生物、生理、地理、地质等诸多学科，从中可见孙宝瑄用功之勤。

第三，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。这一时期，孙宝瑄读的西方社会科学书籍有《西洋历史》《百年一觉》《心灵学》《列国岁计政要》《万国近政考略》《中国度支考》《西学述略》《明治新史》《天演论》《交涉公法论》等。其中，西洋历史每日抄录，以作了解世界之用。对《交涉公法论》用功最勤，感想最多。例如，1897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写道“览《公法论》云：收税之本意，所以为保护全国百姓之费。收他国人之税，所以为居本国之他国人之费。公取公用，特代之管理耳。或曰：君与百官之俸禄，非以入己耶，曷尝尽用诸公？曰：不然。譬诸雇人作工，当给工价。君与百官，亦代百姓作工而已。给以工价，皆为百姓也。惟无道之主，厚敛民以供一人之淫侈，此不平之至也。”^{[1](p.112)}相较于《交涉公法论》，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《天演论》在孙宝瑄这里反响平平。可能的原因是孙已经对西方学问有了相当的了解，《天演论》并不能收到振聋发聩之效。

2. 孙宝瑄的维新主张

通过读书思考,孙宝瑄融汇西学和中学,其维新主张有:第一,核心目标是民主,而民主的体现方式是设报馆、立学校、开议院。他说“愚谓君主时,如小儿初生时,衣食动作不能自主,赖父母鞠育之;君民共主时,如儿稍长,能自主矣,而尚服父母之教命,有不能不分任其劳者;民主时,儿已成立,娶妻生子,听其自主,父母之事毕矣。”^{[1](p.117)}再如,“余谓:王安石言变法,为后世所诟病。法非不可变,未造变法之机器耳。变法之机器奈何?曰:开民智,兴民学,扶民权。民智奚开?曰:设报馆。民学奚兴?曰:立学校。民权奚扶?曰:开议院。”^{[1](p.125)}第二,维新的关键是兴议院。他写道:“或问:孟子云:天下之生也,一治一乱。治久乱生,理之常也。民主之治尚矣,然岂能终保乎?答曰:有治则有乱,若无治乃无乱。民主,无治之治也。夫所谓治者,以一人治万人,而无弗俯首下气,以听其治,此之谓治,然不可久。稍不听焉,而乱生矣。若民主者,几若听民之自治,无治之者也。是故以天下之目视也,以天下之耳听也,以天下之智虑也。惟在议院,无敢私逞其治者,若无治焉,乃永无乱,斯为大治。”^{[1](p.111)}在孙宝瑄那里,维新运动有序有效推进的关键点在议院。议院上承三代之治,能够有效地开启民智和化解纷乱,从而使中国有序地迈入现代化。第三,主张法治。他说“治天下之术无他,法而已。法善,则小人不敢为非;法不善,则君子不得行其是。泰西多为善之人,非人心善也,法使之然也;中国多为不善之人,非人心不善也,法使之然也。或问中国之法与泰西何以异乎?曰:公私而已矣。法为万姓立则公,法为一家立则私。”^{[1](p.189)}

四、经世思想如何与西学接榫

1. 理性辩证的态度,西学中源的方法

孙宝瑄视野广阔,从他读书的书目来看,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史书、辞赋、经义,还是西方的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书籍都在阅读之列,从其结交的友朋来看,不仅有章太炎、宋恕、康广仁、梁启超、汪康年、谭嗣同等中国俊杰,也有英人李提摩太、美人林乐知、日人松林禅师等外国人。他以解决中国问题为读书、求知的核心,只要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的,无论中学、西学,都博采众长。他致力于形成一门融古今、化中西为一炉的“通学”。他说“君主、民主,政异治也。民愚不能自主,君主之,唐虞三代是也。民智能自主,君听于民,泰西是也。而凡所以为民,是政通矣……惟其是耳,非者去之。惟其实耳,虚者去之。惟其益耳,损者去之。是地球之公理通矣,而何有中西,何有古今?”^{[1](p.80)}

如何对待“三纲、五常”是维新的核心问题。从孙宝瑄的态度来看,他反对不平等的人际关系,尤其反对

不合理的君民关系,故此“三纲”必在讨伐之列。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五常,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,无论如何无法放弃。出于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坚守和掌握维新话语权的双重考虑,孙宝瑄和宋恕等人致力于将维新置于中华文明的范围之内,因而形成了独特的西学中源论。如“愚谓孔子苟得志于世,必开议院。何以知之?……介子推相荆,孔子使人往视,还曰:廊下有二十五俊士,堂上有二十五老人。仲尼曰:合二十五人之智,智于汤武;并二十五人之力,力于彭祖。以治天下,其固免矣;以治其国,有不济乎?可以得圣人之微意矣。”^{[1](p.154)}

2. 以“道势易位”、“君民之隔”的问题意识联通中学西学

受经世思想启发,孙宝瑄认识到,中学之弊早已存在。自秦朝一统天下、汉朝罢黜百家以来,儒学借政权之“势”而占据正统地位,但儒学之“道”却受制于政权之“势”。孔孟等先秦诸子的理想从此被束之高阁。他说“今日西教师谓中国亡于孔子教,不知孔子教实未行世。非无诵儒书者,人主辄以俳优畜之,其人亦以俳优自待,实背儒教,于孔子何与耶?”^{[1](p.263)}他说“君位定于民心。田氏篡齐,民心服也。厉王被逐,国人叛也。自鞅、斯创愚民之术,成一统之计,不复问诸民心矣。”^{[1](p.123)}又说“古时皆以德王天下者也,如鸣凤在冈,百鸟朝集;后世皆以力霸天下者也,如猛虎在山,百兽喘伏。”^{[1](p.126)}明亡之后,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人对传统之学的弊病大加鞭挞,使孙宝瑄深有启发。他说“愚谓黄梨洲先生《原君》、《原臣》、《原法》三篇,孔子之复原教也。”^{[1](p.124)}又说“君者,为民而设也。民各私其身,至于相争,有君以平其争,使人人各遂其私,而合群私为大公,此君之职也。故谓君家为公家,以其能合群私也。民有田有货,必纳税于君,非纳于君,纳于公也……后世君不明君为民设之义,以为民皆事我者也。”^{[1](p.286)}孙宝瑄认识到,要想解决君民之隔,实现君民共治,就需要吸收先秦的思想,同时借鉴西方的选举、议会、权利保护等制度。他说“数千年来,君不君者如故也,臣不臣者如故也,不得其法而徒劝,虽齿敝唇焦,无益于事。曰其法安在?泰西之已事可知矣。民权不扶,用人不由公举,行政不出公议,岂能责为君为臣者哉?”^{[1](p.296)}

从这里可以看出,孙宝瑄在民本思想的发挥方面,明显继承了经世派的问题和思想,但在措施方面他又有所突破,他虽承认三代之善,也认为封建制、井田制有益于世,能够一定程度密切君民关系,能够使民间有力量抵御外侮。但是,他认为封建制等只是过渡阶段,最根本的还是要学习西方,兴民权、倡议会、立法治国。他说“民主之天下,集万民之智以自联而相爱。君无常

德，民有常智，是故至治在民主。”^{[1](p.147)}

3. 以“三世进化说”看待中西不同阶段

“三世”说是今文经学派在对孔子《春秋》的解释中而总结出来的。《春秋》体现了孔子改制的精义，而《公羊传》则是学好《春秋》的关键，公羊传中“通三统”、“张三世”的说法，正是通经致用、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。所谓三世，原指孔子当时所传闻世、所闻世、所见世。后东汉何休在《春秋公羊解诂》里，将三世进行了重新发挥。所传闻世、所闻世、所见世分别对应衰乱、升平、太平三个不同发展阶段。晚清学者龚自珍鉴于清代中叶以后，统治黑暗，危机深重的局面，将何休的“据乱、升平、太平”的历史进化说改造为“治世、衰世、乱世”的历史退化论，从而论证变革之迫切性。甲午之时，康有为在《孔子改制考》中，将自己的变法主张融进三世说中，形成了三世进化说。“张三世”，是说社会的发展，按先后次序分为据乱世、升平世、太平世，由乱而治，越来越进步。

康有为的《孔子改制考》遭到了宋恕、章太炎、孙宝瑄等人的批评，认为其学说粗率、孟浪，缺乏考据学的根基，不足以服人。但是，其划分的历史三阶段却受到孙宝瑄的赞同。他说“据乱之世以力胜，升平之世以智胜，太平之世以仁胜。此理如铜墙铁壁，更无疑义……无智无仁而有勇，据乱尚力之世也。有智有勇而无仁，升平之世。智仁勇皆备，乃见太平。”^{[1](p.149)}

孙宝瑄通过“三世”说，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放在了螺旋上升的时间轴上，中国因为没有解决“道势易位”、“君民之隔”的问题而处于据乱之世，西方解决了此问题而处于升平世。于是，西方的民主、议会、选举等就成为中国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。三世进化说与仁、智等儒家核心价值相连通，既承认据乱之世的现状，同时又对未来世界充满希望，比较完满地化解了中学与西学、现状与理想的矛盾，为维新思想铺平了道路。

对于孙宝瑄来说，三世说解释力已经足够，而严复的《天演论》所宣扬的进化论因为掺杂斯宾塞的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，从学理上并不能足够服人，其可取之处仅在于危言警世而已。如“昨读《天演论·导言四》，严又陵案语有云：岛国僻地，物竞较狭，暂为最宜外种闯入，新竞更起。往往岁月之后，旧种渐湮，新种迭胜……余为之掩卷动色曰：诚如斯言，大地之上，我黄种及黑种、红种其危哉！”^{[1](p.280)}

五、结语

作为当时思维活跃的知识分子，通过对孙宝瑄日记的研读，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如下启示：

(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，法学博士)

第一，理性精神使维新思想顺理成章。著名儒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在总结儒学的特点时指出，理性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。他说“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：有之，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。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，不再信赖其他。”^{[6](p.95)} 中国传统文化重在启发人的心智，而不诉诸于迷信。晚清以前，文字狱的文化专制主义使这种理性精神隐而不显，后来由于西方的侵略使清政府中央权威下降，汉族地方势力坐大，因而文化专制才受到抑制。宋恕说：今人动诋国朝汉学诸家考订琐碎，一字千言，以为劳心无用，败坏人才，坐此不知君权独重之世，文网峻密，通才硕彦，不遁而之此，无以寄其怀。自海氛起，而始弛士子谭时政之禁^{[1](pp.151-152)}。因此，甲午前后，随着文化专制的放松，在对中学之弊理性反思基础上，借鉴西学思想维新图强就变得顺理成章了。

第二，维新思想最大的障碍在于视野。中国传统之士人，将时间耗费于科举、治政、诗词歌赋和游乐，将感情寄托于修身齐家和复三代之治。通过对日记的考察，单就孙宝瑄及诸友来说，历史循环论并不成为维新思想之障碍。甲午之前，经世派诸人尽管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，但碍于对西方思想的了解有限，因而只能在现有框架内修修补补。甲午前后，报纸、杂志纷起，电报、铁路、轮船等新工具得到使用，各种西学译著蔚为壮观，新式学校也逐渐出现，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士人的视野极大扩展，维新图强因此成为必然选择。

第三，甲午巨变将问题和道路揭示出来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，清朝经历了30年的发展时期，即所谓“同光中兴”。但是，甲午之败如巨浪袭来，使全国民众从麻木中醒来，甲午之后的巨额赔偿，德国、俄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，国家一时间危在旦夕，亡国灭种之危机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上。同时，日本弹丸小国，通过明治维新而一跃而起，此时已经成为亚洲强国，如此强烈对比，使中国人感触尤深。概言之，甲午巨变完成了变法图新的社会动员，同时亦指明了变法图新的明确道路。从此，向西方学习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。

【参 考 文 献】

- [1]孙宝瑄. 忘庐日记: 上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
- [2]刘大鹏. 退想斋日记[M].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1990.
- [3]王鸿泰. 社会的想象和想象的社会[A]. 陈平原等. 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[C]. 武汉: 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04.
- [4][法]弗朗西斯·魁奈.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[M]. 谈敏译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92.
- [5]翁同龢. 翁同龢日记: 第5册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7.
- [6]梁漱溟. 中国文化要义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5.

[责任编辑 张晓校]